

经典的高度与创新的焦虑

□王爱松

当代中国文学面临困境的两种表现，一是文学经典影响的式微，二是文学创新能力的不足。但这或许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经典影响的式微必然带来创新能力的不足，创新能力的不足也必然伴随经典影响的式微。而且，这种文学的困局，扩大点说还不单纯是中国文学的问题，它还是整个世界文学的问题。即使以毕生之力来品读、研究、推广文学经典的哈罗德·布鲁姆，也不能不以无可奈何的挽歌语调写道：“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不可逆转”。

面对这种不可逆转，有人将其归咎为电视、网络媒体文化的崛起，有人将其归咎为高等教育的平民化导致了审美能力的普遍降低，还有人将其归咎为文学创作的过分市场化带来了“劣币淘汰良币”的畸形局面，当然也有人像布鲁姆那样认为，是大学中以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拉康派、符号学派为代表的“憎恨学派”的风起云涌，扰乱了文学的审美标准和经典尺度：“媒体大学（或许可以这么说）的兴起，既是我们衰落的症候，也是我们进一步衰落的缘由”。

然而文学经典影响的衰落并不意味着经典本身价值的衰落。即使是布鲁姆也注意到，尽管他所说的“憎恨学派”为了抛出更多经典作家的候选人（如非裔美国人和女性作家等），不惜重新定义文学并主张任何一种美学立场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在对真正的经典作家的定位和评价上却并无太大分歧——西方的经典就是以莎士比亚和但丁为中心的。其中的因由，我想与经典的形成与确立机制有关。人们常常试图确立经典的普遍标准，如人性的标准、审美的标准、独创性、超越性之类，但经典的形成和确立，最终所留下的似乎只有一个标准，即是否能逃脱时间的残酷之手而死里逃生或死而复生。在这样的意义上，布鲁姆说经典是一份幸存者的名单”无疑是恰当的。不能通过时间的汰选和考验的文学作品不能成为经典，用布鲁姆的话来说，除了色情作品之外，“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力，即存在于历代读者的不断的重读、重释和重新发明之中。我们可以想象某个当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会成为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但正如布鲁姆所说的，批评家并不能造就经典之作，正如任何憎恨网络不能造就它们一样，“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而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盖棺才能定论的意思。

不过，在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话语境中，有时盖棺也还不能定论。文学传统的形成和文学经典的确立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在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的

领域里，后出的成果往往会产生“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现象，但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里，后出的优秀作家作品却不会降低前代伟大的作家作品的价值。人们不会因为有了莎士比亚便忘记了荷马，不会因为有了卡夫卡便不会再去阅读巴尔扎克。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复古与创新，甚至会构成钱锺书在《论复古》中所说的那种“必死必朽”的人死而复生的现象：“日月无休息的运行，把我们最新的人物也推排成古老陈腐的东西；世界的推陈出新，把我们一批一批的淘汰。易卜生说得好：‘年轻的人在外面敲着门呢！’这样看来，‘必死必朽’的人就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么？不然！《新约全书》没有说过么？‘为什么向死人堆中去找活人呢？——他不死了，他在坟墓里站起来。’当然，这死而复生的人是否因此便获得了永生和不朽，是另一问题，他仍然得接受时间的汰洗和考验。在《鬼话连篇》中，钱锺书曾区分了“immortality”的两层含义：“不朽”和“不灭”。“不朽”包含着一个好的、肯定的价值判断，“不灭”却只是一个纯粹的存在判断：“‘不朽’是少数人的privilege，‘不灭’是一切人的right”。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从其肉身的存在来说，其实都是“必死必朽”之人，但其中少数的伟大作家因为创作了“流芳百世”的经典著作而获得了“不朽”的特权，而更多的作家只是在争取自己的“不灭”的权利。本质上说，所谓“憎恨学派”有时也不过是重新发掘那些已经被湮灭的作家，放大他们为女性代言、为底层发声等的创作行为的价值，为其争取重新“不灭”的机会，并试图赋予其“不朽”的色泽，但这样的作家作品是否真的能实现咸鱼大翻身，从此进入到经典作家作品的行列，则仍然有待时间的证明。

爱默生说过：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这话既昭示了经典的高度，也说明了经典的自负与傲慢。经典的难以企及的经典性，足以产生对后来作家的压抑和后来作家对经典作家的反抗，从而构成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它意味着正像歌德和海明威所领悟到的，任何一个认真的当代作家，都不是同自己的同辈人竞争，而是同古代的伟大人物和死去的优秀人物一决高下。海明威曾说，“这好比长跑运动员争的是计时表，不仅仅是超过同他一起赛跑的人。他要是不同时间赛，他永远不知道他可以达到什么速度。”前代经典的存在，就如人类100米竞赛史上的不断被刷新的新纪录，跑不进10秒以内的运动员注定会被挡在经典时刻的门槛之外。甚至某些号称武侠经典、女性文学经典之类的作品，也难以在文学经典的高门槛面前获得登堂入室的殊荣。这真足以让后来者焦虑和绝望。在过分的焦虑和绝望的主宰下，甚至无论研究者还是创作者都会产生出一种扭曲、变态的所谓独创行为。因为正像白璧德

在《文学与美国大学》中所说的，“真正的原创性实在太难了，因为这要求作品既表现出普遍人性真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达不到这种原创性的情况下，将研究与出风头等量齐观、将反传统建立在无知与无畏的基础之上便成为获得“创新”之美名的两种途径。当然也有人自知难以达到不朽而急流勇退，“人生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俗谚在这类人那里便只剩下了后半句，而长此以往，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的未来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便必然走向一个不可逆转的衰落过程。而事实上，在我看来，人们面对经典的高度，大可不必垂头丧气。因为虽然每个肉身“必死必朽”的人大多不能进入不朽的行列，但却可以留下自己生命和情感的足迹，甚至在一个偶然的时空里拨动另一些人的心弦。至少，当我读到安扎尔杜的如下诗句时，是不禁为其深深打动的。而其作者，恰恰是可以归入布鲁姆多有非议的“憎恨学派”的：1950英里的开放性伤口/划开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庄，一种文化/使我长的身体虚弱不堪/标界的篱笆扎入我的身体/让我四分五裂啊我的王我的王/这是我的家/是我有着带刺铁丝网的/形销骨立的边缘。

自然，人类并不十分清楚经典生成的内在机制。浪漫主义者主张天才最重要，现实主义者主张生活最重要，女性主义者主张性别政治的重要性最重要，然而人们几乎可以找出反驳这每一种主张的强有力的理由。甚至在《欣赏经典》中，王小波还不忘记叮嘱人们，“经典作品是好的，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因为“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就如《红楼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驴了”。这当然也不无道理，《天鹅湖》是芭蕾舞剧的经典，但最坚强入迷的人看上300遍，也照样会觉得难过至极。但可以肯定的是，经典无疑更经得起人们的不断重读，有经典意识的作家也更有可能创造出不朽的杰作。而所谓经典意识，其中的一个重要构件即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的那种历史的意识，即不仅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领悟过去的现存性：“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意识到自己在人类文化链条上的暂时性的宿命而仍不失对永恒性的追求，或许是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得以产生的一个基础。

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不懈推进当代红学的发展

□蒋晓丽 吴若美

此推进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其实，无论作曲家艺术家，还是文艺批评家，对待文艺批评都应有正确的态度。李希凡尖锐地批评了有的文艺批评家对别人的批评所采取的错误态度，认为这种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表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反驳别人批评的时候，不是把批评的意见看成是对于问题的争论，而认为是对他的攻击。这就把本来是原则问题的争论偏到个人是非上去了。这种对待文艺批评的态度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带有主观性的。一个人看问题有了主观的成见，他就不可能冷静地分析事实，不仅是对待批评采取个人主义的态度，甚至把本来是原则问题的争论也引到非原则的个人纠纷上去。这种错误对待批评的态度表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反驳别人批评的时候，不是采取同志式的商讨问题的态度，而是采取一种冷嘲、讥讽、奚落的态度。“在争论中间，当然也可能出现错误的批评。被批评者完全有理由进行反驳。不过，批驳应该是为了探讨真理，而不是为了发泄个人意气。”(《李希凡文集》第6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210—313页)这就是说，李希凡不仅积极参与文艺论争，而且重视理论上完善文艺批评。李希凡对这种对待文艺批评的错误态度的批评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至今仍然没有丧失理论威力。

二是敢于坚持真理和绝不随风摇摆。李希凡的研究领域非常宽广，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在中国现代文艺批评评论方面也是硕果累累。从1955年到1986年，李希凡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对《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红岩》《苦菜花》等优秀长

篇小说的评论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60年来历次参加的文艺批评活动中，李希凡一以贯之地坚持着自己的文艺批评方法，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文艺批评锋芒。李希凡高度肯定毛泽东批评《红楼梦》的历史视角，认为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这就是说，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绝没有损害《红楼梦》；相反，只把《红楼梦》说成是一本“爱情小说”，倒是贬低了《红楼梦》的价值。

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李希凡坚信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作品，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是在“相当的基础上产生”的。李希凡提出了“还原历史真实”论。这就是李希凡把握《红楼梦》的人物形象是从《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出发，而不是脱离这个时代。所以，李希凡不仅反对文艺理论家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而且反对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俞平伯认为，林黛玉、薛宝钗虽然是情场冤家，但曹雪芹却把这两美合二为一。而李希凡则认为，林黛玉、薛宝钗是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形象，虽不是对立的两极，却也绝不是可以混同的“合一体”。“钗黛二人性格迥异，所谓‘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各具特有的人生底蕴和精神内涵，不止她们的音容笑貌，情态各异，就是她们的美丽与智慧，也有着不同的风格和神韵，是曹雪芹的如实描写，不是实为一人的幻笔。”(《李希凡文集》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423—424页)虽然伟大文学经典存在超越时代而属于未来的東西，但仍然是时代决定这些伟大文学经典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与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和俞平伯的“钗

黛合一”论相比，李希凡从《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出发无疑更能把握《红楼梦》中的典型人物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三是勇于自我批判和修正错误认识。李希凡坚信，没有文艺论争，就没有文艺进步。认为文艺论争是学术争鸣的重要方式。李希凡认为，在文艺论争中，不怕稚嫩，不怕勿促，即使扭曲的批评也可以在新的批评实践中纠正，直面的批评有助于双方提高。因而，李希凡从不惧怕“权威”，而是积极参与文艺论争。

早年，李希凡对京剧《四郎探母》的批评至今仍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没有丧失思想锋芒。李希凡认为，《四郎探母》这出唱念做打均佳的完美剧目对杨四郎的思母情结表现得何等深切！对承诺公主的誓言又是何等的“守义”！但是，这种所谓伦理之爱的“人情”却美化了变节的杨四郎的灵魂，丑化了杨家将。晚年，李希凡继续尖锐地批判了“大学问家”胡适，没有丧失文艺批评的锐气。一季，李希凡从文学上批判了胡适关于《红楼梦》无价值的妄断，认为胡适对《红楼梦》的理解和评价不但是浅薄和无知的，还多多少少带有洋场绅士轻视优秀民族文化遗的异味。1960年，晚年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越来越低，不仅没有修改他在20世纪20年代对《红楼梦》的评价，还挖苦曹雪芹的文化修养，认为曹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李希凡严厉地痛斥了胡适对《红楼梦》的这种偏颇评价，责问“胡适不是熟读‘中国古典’的大学问家吗？如果他真正得到了传统文化的‘修养和训练’，真正读懂了《红楼梦》，怎么会连曹雪芹及其

伟大杰作《红楼梦》的深厚文化底蕴都没有一点体会和认识！”(《李希凡文集》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548页)二、李希凡从政治上批判了胡适。李希凡指出，早在“五四”后期，胡适就在那里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胡适一方面大肆宣扬什么老子所谓的‘不争’学说，和他的‘不抵抗主义’的和平主义；一方面又向日本侵略者献言献策，说什么‘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并成为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的成员。甚至直到抗日战争激发起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和大反抗，并终于取得伟大胜利以后，他还以中日两败俱伤而哀叹他的‘不抵抗主义’的不得实现。”(《李希凡文集》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551页)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有些人捧抬缺乏文学“修养和训练”的“大学问家”胡适是半睁眼睛的批评，无助于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

李希凡不仅敢于批评，而且敢于自我批评。首先，李希凡认真清理了他在1957年的那种“左”的、教条主义的文艺思想。李希凡坦承在1957年把刘绍棠那篇《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作为所谓“右派”文艺观来批评的也有他一份，并深感内疚。其次，李希凡绝非讳言他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所犯过的幼稚病和粗暴的错误。李希凡虽然强烈反对那种认为《红楼梦》是“生活实录”的论调，但在批评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却犯了这种错误，认为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并不存在官僚主义，并用这种条框框批评了这部文学作品，还给作家扣上了一顶帽子。李希凡还对他过去轻视考证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曹雪芹的身世经历，特别是《红楼梦》，只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确实也需要科学的考证工作”。(《李希凡文集》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686页)李希凡就是在这种自我批评中不断完善以往认识的。

诗人呼吁恢复“诗人节”传统

本报讯 近日，第八届天问诗歌艺术节在云南大理举行。活动期间，50余位诗人和艺术家倡议恢复诗人的传统，“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

诗人们在艺术节上呼吁，农历五月初端午节既是对伟大诗人屈原的纪念，也是对诗歌传统的建构，更是对诗意在现实人生中重要性的确认；语言通过诗歌复活，诗歌通过语言培育文明，诗人通过创造性劳动捍卫母语的尊严；诗人的节日旨在激发对生命的热爱，唤起对自然的尊重，恢复对天地的敬畏；人人皆诗人，诗人节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节日。

诗人的节日传统可追溯至1939年夏，为发扬屈原精神，老舍等文学前辈公议以每年端午节为诗人节。1941年端午举行的第一届诗人节上，老舍、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胡风等联名签署了《诗人节宣言》，在抗战烽火弥漫的时刻，发出“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的声音。

艺术节期间举行了第五屆“天问诗人奖”颁奖典礼，诗人雷平阳获此殊荣。评委会认为，雷平阳对本土文化与生活的深刻体验，赋予他的诗歌一种淳朴而强悍的大地风格，同时他将这种看似僻远的云南生活置于广阔的世界性背景之中。他的语言态度是坦率的，他的作品形式是富于创造力的，生动地演绎了诗歌写作艺术的当代敏感。此外，多位诗人的诗歌朗诵音乐会也在活动期间纷纷亮相。(黎华)

《葵花女》体现人性思考

本报讯(记者 王觅) 3月29日，由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主办的魏玉明长篇小说《葵花女》研讨会在京举行。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辽宁抚顺作家魏玉明创作的两卷本长篇小说《葵花女》2013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获得读者好评。作品叙事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讲述了主人公许丽诺从童年到中年曲折跌宕的人生历程。她虽历经磨

难，但始终抱持对生活的信念和热忱。与会

者认为，作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通过主人公短暂而平凡的一生，艺术地诠释了坚忍、善良、执著、宽容的“葵花精神”。面对逆境、窘境、迫害、疾病甚至死亡，主人公的人生之光不灭，爱与忠诚、爱与奉献的热力使其获得重生。这样一个如葵花般永远追求太阳光辉的女性形象，体现出作者关注现实的社会担当和深切的人性思考。与会者还就《葵花女》的电视剧改编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诗人纪念袁崇焕诞辰430周年

本报讯 今年是袁崇焕诞辰430周年，3月26日，纪念袁崇焕诞辰430周年诗会在京举行。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张桂兴、解放军总装

备部原副政委李栋恒、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等几十位将军、诗人吟诵了自己创作的纪念袁崇焕、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诗歌作品。诗

歌结束后，从东莞抵京的诗人们还看望了袁崇焕墓的第17代守墓人、今年75岁的余幼芝。

祖籍东莞的袁崇焕投笔从戎

后多次击败后金的进攻，后奸人所害被处死，体现了凛然正气。

据悉，电视剧《袁崇焕》也正在筹拍之中。

(李晓晨)

专家研讨新荷花淀写作

本报讯 3月29日，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40余位作家、评论家聚集河北廊坊师范学院，以廊坊两位散文作家孟德明、焦喜俊的作品为切入点，就冀中地区的文学展现，与会者认为，二人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雅俗结合有致，语言质朴灵动，展现了冀中地区独有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

本报讯(记者 王觅) 3月27日，由江苏省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和中共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新童谣创作征集活动在京启动。

此次新童谣创作征集活动以“核心价值观沐浴我成长”为主题，面向全国儿童文学作家和少年儿童作者征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童谣作品。

主办方介绍，此次新童谣创作要求遵循贴近儿童、融入生活、寓教于乐、深入人心的理念，从细微入手，点点滴滴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的内涵，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作品应当体现“以境融理、以事蕴德、以趣扬荣”的特色，富有时代气息，童趣盎然，简洁明快，朗朗上口，以引导孩子们感知、领悟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活动将从来稿中评出90首优秀童谣并宣传推广。应征作品可登录江苏省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官方网站查询详情。

报告文学《乌蒙长歌》首发

本报讯 3月21日，李朝德长篇报告文学《乌蒙长歌》——当代愚公·陆良八老人首发式暨研讨会在云南曲靖举行。

陆良县龙海乡的8位普通农村老人，30余年在石漠化的荒山上植树造林7400亩，造福乡梓，被誉为“当代愚公”。《乌蒙长歌》——当代愚公·陆良八老人以纪实手法真实再现了陆良八老人扎根荒山30年造林，并把林场无怨无悔献给国家的感人事迹。

与会者在研讨中谈到，作品把生

态环境

作为一个重点来介绍，对生态

的全面反思不仅放在陆良八老人

的生活、龙海乡，而且延展到了曲

靖、云南甚至全国。同时，这部作品用

更多的笔触关注人的内心生态，即社

会生活中人生的价值及追求的探索

和思考，通过八老的事迹阐述了物质

意义上的生命没有永恒，惟有高尚的

精神世代相传这一崇高的主题。

(欣闻)

批评是对话，也是创造

□张清华

批评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具有内心性和对话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这个说法非常抽象，但也很具体，需要用心去细细体味；钟嵘《诗品》中将诗人分为上中下品，几乎是无来由的划分，须要用心慢慢研磨，咂摸滋味；“批评”在明代的繁盛，是因为小说的流布，读书人将阅读的心得掺合于原作的文末或行间，行间为批，首末为评，表示对作者的一种理解，或向读者的一种推荐，甚至也可能只是一种自得的消遣或卖弄，或作为私人收藏的一种“雅趣”，这种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学中的“批和评”，也构成了最早的“中国式的解构主义文本”。总之，这种文字的掺入并无“学理”或“法理”的依据，也不是全然准确的判定，而根本上只是一种理解和对话，且具有很强的“私人性”。

现代意义上的“批评”概念来源于西方，特别是19世纪以后的革命风潮，对于文学以及批评的影响最大。批评中间缠绕了“知识”与“工具